

论汉文化东传的途径及研究的意义^{*}

李德山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汉族及其前身华夏民族不断学习和吸收其他各族之长,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艺术风格。这种文化艺术风格,就是汉文化。汉文化形成后,即开始东传进入了东北边疆,引起了古代东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刻变化。研究汉文化东传,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古代东北及东北亚地区的历史变化。

关键词 汉文化 东传 途径

作者李德山,1962年生,历史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地址:长春市人民大街5268号,邮编130024。

汉文化,是指古代主要由汉民族及其前身华夏民族不断学习和吸收其他各族之长,逐渐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化艺术风格,主要包含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特点、价值观念等内容。汉文化是中国古代先民的伟大创造,是先民价值观念与自我本质在客观世界中得以实现的表征,是当代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和骨干。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汉文化虽然呈现着时代的特点,但其内核,即物质、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的结构,却不发生改变,具有超强的稳定性。在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汉文化一经形成,就不仅以其自身的许多先进性特点展现了一种地域中心文化的重要价值,而且又以其独特的地理优势与人文优势,开拓了许多文化对外辐射与传播方面的重要渠道。

(一) 汉文化东传的途径

汉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文化,同其他类型的文化一样,形成后在空间形态上具有两种重要特征:地域性和流动性。所谓地域性,是指汉文化的创造与产生,都是在中原的地域环境中实现的,其类型、特点、风格无不反映着中原地区的自然与社会条件。所谓流动性,是指汉文化形成后,同任何一种文化形式一样,有向其他地区不断流动、发散、位移、辐射的过程,也就是文化传播学上所说的“传播”。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在西方形成了文化传播学派并提出了文化传播的理论。其理论认为,文化是若干文化物质或文化元素的集合体,这种文化集合体从一个社会传递到另一个社会,从一个区域播散到另一个区域,从而构成了一个广大而又宽阔的文化圈。“这种把人类文化看成是一种动态的,不断流动、迁徙过程的理论,是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① 汉文化的传播也是如此,并且有史实的有力支持。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汉文化东传与古代东北社会变迁研究”(项目批准号:11AZS004)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蔡丰明主编:《吴越文化的越海东传与流布》,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汉文化圈的存在早已是中外学术界的共识。文化圈一旦形成,紧随其后的便是两种以上文化层次落差的形成。东北各地各族的文化与汉文化有较大的落差,此种情形,是汉文化东传的动力。具备了东传的动力,那么汉文化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方法或途径东传而进入东北及东北亚地区的呢?总结起来,大约采取了这样三种方式:扩展传播、扩散传播和接受传播。

(1) 扩展传播,又可称其为文化播化。此种传播对文化圈的形成极具建设性,其动力在于“中枢指向”(Central Direction)的渗透压。所谓渗透压,这里是指高层位文化与低层位文化接触时,所产生的位能差。在渗透压的作用下,文化现象从其起源地向四周不断地扩大分布范围,接受该文化现象的人犹如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

作为世界上形成最早的原生文化和高层次文化之一,汉文化内聚的渗透压一直渴望释放,以实现其教化的功能。但限于汉文化所在地域独特的历史和地理条件:东临大海,北连大漠,西为喜马拉雅山、帕米尔高原所阻,这就很自然地促成其流向为向东、向东北、向东南。东北及东北亚地区最早受汉文化扩展传播影响的地区是辽西、辽东及朝鲜半岛等地。

辽西与燕赵毗连,辽东半岛、朝鲜半岛隔渤海与山东半岛相望,此为汉文化东传的地缘优势。从《史记·伯夷列传》之《索隐》所载“汤特封墨台式于孤竹”,可知早在公元前16世纪,殷商的封国孤竹就已立国于辽西了。到春秋时期,根据《史记·齐世家》及《国语·齐语》、《管子·小匡》、《说苑·权谋》的记载,齐桓公屡次用兵讨伐位居今河北东北部和辽西地区的山戎、孤竹、令支诸族,将其纳入到齐的势力范围之内。公元前284年以后,燕在击破东胡、略属古朝鲜后,“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①五郡中的右北平郡,大致包括今辽西大凌河上游以南至河北承德、天津蓟县等地;辽西郡不仅包括今辽西地区,而且还领有今内蒙古赤峰市一部分;辽东郡不仅包括今辽东半岛,而且还领有朝鲜半岛北部地区。这一举措,就把上述地区直接置于周王朝诸侯国燕国的管理之下了。公元前222年,秦军大将王贲攻打燕国,并“拔辽东,虏燕王喜,卒灭燕”。^②秦朝建立后,仍循燕制,袭置右北平、辽西、辽东三郡进行管理。汉朝建立后,除保留右北平、辽西、辽东郡外,武帝于元朔元年(前128)再置苍海郡,^③元封三年(前108)灭亡古朝鲜后,在今朝鲜半岛等地又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④后来诸郡虽有一些分合裁并,但终两汉王朝之时,以郡施政管理辽西、辽东及朝鲜半岛的手段则没有变化。

地缘的接近,自商至两汉管理制度的逐渐等齐,使辽西、辽东及朝鲜半岛演变为汉文化的直接辐射区,汉文化可以在此地无障碍地扩展传播。各种政治性的统治制度设立并完善后,大批中原官吏、家属及其随从源源不断进入辽西、辽东及朝鲜半岛,带来了先进的汉文化,促使这一地区的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史载西汉官吏初至此地时朝鲜、秽貊和高句丽诸族,“吏见民无古臧,及贾人往者,夜则为盗,俗稍益薄。今于犯禁浸多,至六十余条。可贵哉,仁贤之化也”。^⑤这证明汉文化东传对这些民族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①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② 《史记》卷34《燕召公世家》。

③ 参见《汉书》卷6《武帝纪》。

④ 参见《史记》卷115《朝鲜列传》;《汉书》卷6《武帝纪》。

⑤ 《汉书》卷28《地理志》。

另外,汉文化扩展传播的区域,主要为秽貊族系的居住地。自先秦至隋唐,在东北地区的三大族系中,秽貊族系的政治进程和经济发展一直居领先地位,特别是夫余和高句丽,先后建立起了强大的地方少数民族政权,国祚分别延续了六七百年。这一历史现象绝非是偶然出现的,显然是他们最早受到汉文化熏陶并加以借鉴的结果。正如《后汉书·东夷列传》所言:“东夷率皆土著,喜饮酒歌舞,或冠弁衣锦,器用俎豆,所谓中国失礼,求之四夷者也。”

辽西、辽东和朝鲜半岛临近汉文化原生地带,亦是中央王朝在开疆拓土过程中最先施行郡县化的地区。此种特征,决定了这一地区成为汉文化东进扩展传播的直接辐射区。在这里,高层位先进的汉文化拥有强大的融合力量,于是汉文化圈便继续膨胀。扩展传播的汉文化,其影响主要体现在制度、物质、思想与价值诸层面。

(2) 扩散传播,又可称其为迁移扩散,“指某种文化通过具有这种文化特征的个人或集团的迁移而从其分布区传播到新的地方。这种扩散可以随移民的长途迁徙而越过海洋、高山与沙漠,因此,这种扩散形成的分布区与原分布区可能互不相连”。^① 个人不论,集团一般包括了商队、军队、船队或集体移民。汉文化东传,扩散传播同样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原地区的个人或集团向东北地区的迁移,就现有的文献记载看,开始于三代时期,一直延续到清末而不绝。迁移的原因虽然复杂多样,但每一次迁移后的效果却是一致的,都为东北地区注入了新的汉文化因素。

三代时期最著名的迁移,是在周灭商后,殷遗箕子不忍为周臣,率领 5000 人迁入东北,最后定居于朝鲜半岛北部而建立箕氏朝鲜政权。《尚书大传·周传·洪范》记载:“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为周之释,走之朝鲜。”而《后汉书·东夷列传》则谓:“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箕子教以礼义田蚕,又制八条之教。”可见箕子东迁,将华夏文化一并带入,用以教化当地的古朝鲜族。至于教化的结果,《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说:“无门户之闭,而民不以为盗。”汉文化的到来,极大地开启了此前尚处于原始社会的古朝鲜族的民智,“箕子的教化,使古朝鲜族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倖似中华’,一跃而与燕齐,进入到了奴隶制社会,箕子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② 自此之后,中原人口向东北地区的迁移便史不绝书。中、小规模迁移不论,仅就大规模的迁移而言,则有隋大业八年(612)发 30 多万大军征讨高句丽,“及还至辽东城,唯二千七百人”,^③ 除战死者外,绝大多数被俘后留居在了东北地区。契丹政权及辽朝建立后,通过数次对北宋用兵,将大批掠获的汉族人口迁移到东北,仅上京(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东京(今辽宁省辽阳市)、中京(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三京丁籍可纪者二十二万六千一百,蕃汉转户为多”。^④ 三京之外的东北各地,亦有迁移来的大量汉族人口。根据统计,辽朝共有汉族人口约 570 万人,^⑤ 迁移后居住东北的,约有三分之一强。“靖康之难”发生后第二年(1127),金兵押解北宋徽、钦二帝以下凡 10 万余人北还,《靖康稗史笺证·瓮中人语》记

① 王恩涌:《王恩涌文化地理随笔》,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第 18 页。

② 李德山、栾凡:《中国东北古民族发展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12 页。

③ 《资治通鉴》卷 181,大业八年七月。

④ 《辽史》卷 36《兵卫志》。

⑤ 参见路遇、滕泽之:《中国人口通史》,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59 页。

载,进入东北约有1.4万余人,随二帝终达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的皇亲宗室有千余人。金朝中前期,一直采取迁移汉族人口入东北政策,章宗时东北总人口约有300万人,其中约有“一百数十万”为自塞内迁出而来。^①清朝前期,大批文化流人和其他方面流人迁移入居东北。据统计,因各种罪名发遣来的流人,约在四五万人,“加上家属(相当一部分无家属)当在十万左右”,“占乾隆中叶东北人口总数的四到五分之一”。^②清朝后期封禁政策废除后,关内大量汉族人口移民东北。自嘉庆十七年(1812)至宣统三年(1911),仅奉天(今辽宁省)、吉林二地人口就达1850万人,除去自然增长率百分之十外,余皆为移民增长,“平均每年移民进入还要达到84万人”。^③

诸如此类或主动或被动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汉族人口如插花般星散于东北和东北亚各地,并使汉文化在这里扎根并结果,对周边各个民族产生了广泛的扩散效果,深刻影响了东北古代社会的发展。扩散传播的汉文化,其影响主要体现在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和物质诸层面。

(3)接受传播,或可称之为摄取传播。顾名思义,接受传播就是东北和东北亚地区各个古代民族,或者各种民族政权,以及各个国家,主动迎请汉文化所形成的一种文化传播途径。此种传播,在中外文化扩散研究领域,尚较少有人关注。如学术界多因循瑞典地理学家哈格斯特郎(Torsten Herstrand)的理论,把文化传播分成扩展传播和扩散传播两大类。^④一般而言,接受传播有赖于两种以上文化层次落差的形成,而其动力在于低层位文化拥有者对高层位文化的“追忆共同体”(Anamnaestic Coreceptor)意识催化下的对先进文化的醉心与追慕及求索。汉文化在东北地区的扩展传播和扩散传播,主动性在汉文化自身,而接受传播,主动性则来自于被传播者自身。这是二者最显著的区别。

由于文化层位差的存在,东北及东北亚地区的各民族、各种性质政权都对汉文化表现出了比较强烈的追慕心理,使汉文化的东传,在有了扩展和扩散这两种传播途径外,又有了此种独具特色的传播途径。具体过程则表现在:其一,接受中央王朝的管理,要求封号,请求官职,接受正朔,主动内附。例如契丹,在隋朝开皇四年(584),“契丹主莫贺弗遣使请降,拜大将军”。^⑤唐朝贞观二十二年(648),契丹首领窟哥率各部“咸请内属,乃置松漠都督府、无极县男,赐姓李氏”。^⑥奚族首领在唐朝亦被赐姓李氏,^⑦其首领李大酺、李鲁苏、李延宠又分别迎娶了唐朝公主为妻。^⑧其他古民族及古民族政权也莫不如此,如箕氏朝鲜和卫氏朝鲜、夫余及夫余政权、高句丽及高句丽政权、乌桓、鲜卑、鲜卑慕容氏政权、室韦、勿吉、靺鞨之黑水靺鞨、渤海政权、未建国之女真、明代女真诸部等。其二,民族、民族政权或国家派遣部落首领、王子、僧侣以及各类上层人士,或者个体,或者集体来到中原地区,或者朝贡,或者随侍,或者入质,或者游历,或者求学。例如渤海政权在其存世的

① 路遇、滕泽之:《中国人口通史》,第536页。

② 佟冬主编:《中国东北史》第四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688页。

③ 路遇、滕泽之:《中国人口通史》,第868页。

④ 参见王恩涌:《王恩涌文化地理随笔》,第17—18页。

⑤ 《隋书》卷1《文帝纪》。

⑥ 《旧唐书》卷199《北狄传·契丹》。

⑦ 参见《旧唐书》卷199《北狄传·奚》。

⑧ 参见《旧唐书》卷199《北狄传·奚》;《旧唐书》卷199《北狄传·契丹》。

228年间,凡朝唐132次,朝梁5次,朝后唐6次。^①自高王大祚荣开始,即向内地派遣留学生,学习唐朝文化,每次派遣人员数量不等,少则数人,多则十余人。此外,还经常派遣王子到长安随侍或入质。经过不断地学习汉文化,终于使其创造出了“大抵宪像中国制度”的灿烂的渤海文化。^②再如日本,自7世纪初至9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里,日本为了学习汉文化,先后向唐朝派遣了18次遣唐使团。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盛举。需要指出的是,渤海对汉文化采取的是拷贝式的摄取,而日本则是借鉴式的摄取。其三,重用汉族知识分子,推崇孔子及儒家思想,并以其为施政的指导。例如,耶律阿保机重用韩延徽诸人,才使契丹政权得以建立并巩固。金朝兴定三年(1219)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途中,遣使征召丘处机。六年(1222),二人相会,丘处机为成吉思汗讲解救民济世之道,对成吉思汗晚年思想变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元朝的建立者忽必烈,从藩王时就热心学习中原文化,身边聚集着宋印简、刘秉忠、王鄂、元好问、张德辉、张文谦、窦默等著名学者,忽必烈经常询问其以儒学治道的方法。

汉文化在东北及东北亚地区的接受传播方式,实际上丰富了汉文化东传的内容与形式,并与另外两种传播途径相互配合,相互补充,为汉文化的东传和汉文化圈的不断扩大,做出了积极贡献,其影响主要体现在制度、思想与价值、物质诸层面。

(二) 研究汉文化东传的意义

研究汉文化东传,其实质是在揭示一种文化传承演变的轨迹及其真相,输出地和输入地的各种关系,并进而透视古代东北及东北亚地区历史发展的脉络。其主要意义,大约在于下述。

(1) 丰富我国文化传播学、文化地理学和文化社会学等学科的内容,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传播学、文化地理学和文化社会学等学科提供学术参考。就目前的上述几个学术领域而言,西方学者的研究及其所形成的理论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国内的研究始终处于后进的状态。西方学者的研究可借鉴之处虽然很多,但由于受多种原因的制约,主观性的研究和片面性的观点并不罕见。前已述及,哈格斯特朗的文化传播理论就缺乏对接受传播或摄取传播的研究,故而其总结出的传播途径便不全面。再如,文化传播论的文化社会学观点,无论是德国的文化圈派、英国的传播学派,还是美国的历史学派,往往把人类形形色色的文化归结为单一的、一次性的现象。在他们看来,任何文化现象在历史上都只是一次性出现的,其他地区相同的文化现象都是由此地传播的结果,人类的一切文化只有一个中心。“他们否认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性及各民族文化发展的独立性,并且在研究方法上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对立起来,用‘个体’的分析来排斥普遍的科学研究,因此,他们的理论和方法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③

汉文化东传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揭示其东传的动力及途径,影响及嬗变,及其对古代东北与东北亚社会产生的正、反作用力,可以深刻认识汉文化传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① 参见金毓黼:《渤海国志长编》卷16《族俗考》。

② 《新唐书》卷219《北狄传·渤海》。

③ 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25页。另参见人文地理学编写组:《人文地理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219—220页;杜翔:《文化交往论》,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3—44页。

同时,这种研究也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汉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以及汉文化圈的形成轨迹,为中国文化传播学、文化地理学和文化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和建设,提供学术材料、学术方法、学术理论。

从此前的研究看,在我国的文化传播学、文化地理学和文化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过程中,如何将已有理论,特别是那些西方移植来的有关理论与方法运用于我国文化与社会及各相关领域的实际研究,并在研究实践中掌握我国的历史现象和特点,探索我国上述诸学科的发展道路,始终是这些学科发展的一个中心问题。对汉文化东传相关史实的研究,仍然是一种探索中的再探索,其理论价值和学术意义也即在于此。

(2) 推动东北史及东北亚史领域研究方法的创新。自 20 世纪以来,东北及东北亚史研究工作有很大的进展,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下,一些重大历史问题,如东北史分期,东北古族、古政权和古国与中原及中央王朝关系,东北古民族的起源、发展、演变,不同时期东北的军、政制度,不同时期东北的土地制度及特点,东北的宗教与文化,内外战争,民族迁徙,农业手工业生产,商业贸易,驿站交通等,都有相当多研究,并取得了许多公认的成果。我们必须十分珍视这一批巨大的研究收获。

但毋庸讳言的是,目前在东北及东北亚史领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一是理论基础薄弱,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立论不够明确,分析不够深透,而是往往限于一般化或浅尝辄止的倾向。东北及东北亚史有关理论方面的问题是不少的,比如,东北古民族的内聚力问题,古代东北社会发展动力问题,东北及东北亚区域文化建构问题,等等,都需要我们加以关注并加以解决。二是研究方法不够丰富,考据加叙述的史论结合的方法代代相因,造成了手段落后,方法简单,思路狭窄,进展速度慢的后果。

为了改进研究方法,提高研究水平,东北及东北亚史研究必须面向世界,与时俱进,了解当今世界出现的史学流派和史学研究方法,以及相关相近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并加以批判性地借鉴和应用。把文化传播学、文化地理学、文化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有选择地应用到东北及东北亚史研究的相关领域,是可以解决或帮助解决一些本领域存在着的问题的,例如,汉文化圈在东北及东北亚地区的扩展及影响,东北及东北亚区域文化与汉文化的关系,汉文化东传影响下东北及东北亚地区的社会变迁等问题,如果既使用传统的考据与排比、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具体与抽象的研究方法,又运用文化传播学、文化地理学、文化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这些问题就会逐步被我们所认识。

此类新理论、新方法,被借鉴引入东北及东北亚史研究领域,将会促进这一研究领域的自我转换,自我更新,不断丰富发展自己的理论方法系统,以指导我们前进。此亦为其理论价值和学术意义之所在。

(3) 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认识和了解东北及东北亚区域文化的内容、性质、作用等,以弥补此前研究的不足。以东北区域文化为例,所谓的东北区域文化大体上可划分为古代东北区域文化和现代东北区域文化两种。古代的部分,是东北地区古代秽貊族系、肃慎族系和东胡族系先民们的伟大创造,其内容瑰丽,特点鲜明。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它负载着东北民族的价值取向,影响着东北民族的生活方式,聚拢着东北民族自我认同的向心力。但由于汉文化通过各种途径的持续东传,使东北区域文化发生了自觉或不自觉的变迁,时间越往后推移,特征就越明显。所以,大约自汉唐以后,古代东北的区域文化,实际上已经是一种“文化融合”后的新文化了。虽然这种新文化因为地区和民族的不同仍然呈现着一定的差异

性,但都是受了汉文化的影响而发生了变迁,则是不争的事实。

文化融合,在文化人类学中有着特定的含义,“它是指两个不同文化系统的特质融合在一个模式中,成为不同于原来的两个文化的第三种文化系统。在这个新文化系统中,先前的两个系统已不存在,但可以从这个新的系统中看到它源于前两个系统”。^① 古代东北区域文化就是如此,它的内涵既有各个民族特有的内质,也有汉文化因素注入其内。这个新的文化系统其源头之一在东北,另一个源头则是自中原内地不断涌入的汉文化,二者从接触到碰撞,从交会到融合,最终形成一种新的且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所以,古代东北区域文化就呈现着多源一体的风貌。通过研究汉文化东传的历史过程,透视东北区域文化的产生、发展及演变轨迹,我们肯定会有许多的新发现。

现代东北区域文化,是古代东北区域文化的再继承和再发展,是古代东北先民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由于文化与民族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文化特点和文化传统是民族的重要标志,民族是文化存在的载体,“民族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过程”,^② 所以,梳理清楚古代东北区域文化的轨迹,既可以帮助我们全面而深刻地认识现代东北区域文化,更可以借此全面而深刻地认识当代的东北民族,特别是那些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在现代社会里,区域性的,或者民族性的传统文化,往往以非主流文化的形式存在,面对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化的冲击,非主流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有被逐渐边缘化和碎片化的危险。通过研究,我们就会对现代东北区域文化有着整体性的把握,因为我们了解它的历史,了解它与汉文化的深刻关系,了解它在古代中华民族内聚力、向心力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所以为我们一分为二地保护传承其精华,扬弃其糟粕,提供了历史的、理论的依据。另外,通过探讨汉文化东传,东传后与东北社会在文化领域产生的多层次的复杂关系,还有利于我们从民族与文化的视角,促进东北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审慎处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过程中出现的相关问题。

(4) 通过研究汉文化东传,可以加深对东北史领域一些具体问题的认识,或提供更宽阔的视角,展开更广泛的讨论。例如,东北史中的东北古代社会变迁问题。众所周知,古代东北地区的社会变迁,有这样的特点:一是不平衡性。虽然同处于中央王朝的管辖下,但各地、各族发生社会变迁的时间并不同步,仅就社会性质这一种变迁形式来说,渐北渐晚的趋势十分明显。二是发展的螺旋式。一般而言,社会变迁的态势是由较低层次的社会向较高层次社会一级一级发展,而古代的东北地区并非如此,社会变迁不是直线式而是曲折式的。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社会,有时甚至是一个王朝,发展到一定高度后,由于内外力的作用,突然停滞不前直至彻底灭亡,其地其族的社会发展便衰落得十分严重,有的甚至又落回到了原点。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东北地区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其特点不是连续性,而是间断性。”^③ 秽貊族系、肃慎族系、东胡族系也好;鲜卑族建立的国家、契丹族建立的国家、蒙古族建立的国家、靺鞨族建立的渤海、完颜女真族建立的金朝、满族建立的清朝、夫余族建立的国家、高句丽族建立的国家等也罢,都是如此。

学术界在总结这种现象时,多考虑统治民族的变更、汉族政治经济的影响,使其生产力

① 杜翔:《文化交往论》,第206页。

② 周星:《民族学新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8页。

③ 薛虹、李澍田主编:《中国东北通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页。

和生产关系发生了变化。其实,这只是影响其社会变迁及呈现如此变迁特点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汉文化东传后所引起其地其族之文化变迁使然。或者说,文化变迁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造成了东北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不平衡性和螺旋式变迁的特点。由于文化变迁和社会变迁密切相关的不可分性,相互具有的作用力性,以至于有些文化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习惯用“社会文化变迁”一词将其合二为一,并以其阐明和研究相关问题。总之,社会变迁除了最终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之外,还取决于文化传播、自然环境、人口变化、社会制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它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显然,如果把汉文化东传这一历史现象融入于古代东北地区的社会变迁研究,就会把这一过程和特点阐释得更加清楚。

再如东北地区在东亚环海汉文化圈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就东北史领域自身而言,长期以来很少有人关注。东北史领域之外的研究,就已有的研究成果看,一是更重视汉文化的跨海传播;一是虽然提及东北地区的陆路传播,但往往是对历史过程的客观描述,而没有总结和概括,对东北地区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略而不论。实际上,在汉文化东传及东亚环海汉文化圈体系构筑过程中,东北地区的地位和作用十分突出,在许多方面都起到了“二传手”的作用。特别是对日本列岛而言,在汉文化东传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不逊于跨海传播。古代倭国和日本所称呼的“归化人”和“渡海人”,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从东北各地跨海抵达的。渤海王国时期,共遣使日本 35 次,人员少则十几人或几十人,多则上百人或几百人。由于自东北地区迁入日本的“归化人”、“渡海人”多数为汉族或汉族的后代,渤海王国文化为拷贝后的汉文化,所以,尽管其出发地不在中原,但带去的仍然是汉文化。东北地区的间接传播和跨海传播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共同推进了古代日本列岛文明的发展。研究汉文化东传,可以准确地定位古代东北地区在东亚环海汉文化圈体系中的地位与影响。

总之,汉文化东传是指古代汉文化向我国东北地区及东北亚地区的辐射与传播。这种辐射与传播,从现有的历史记载和考古材料看,大约开始于三代时期,持续到清末而不绝。汉文化东传持续的时间如此之长,是因为支撑东传的各种力量交互作用。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汉文化在东北边疆地区的传播和扩散,便不可遏制而流行开来。在中原地区与东北及东北亚自有文化融合后,促生出了独具特色的汉文化的亚文化——东北地方文化。

〔本文责任编辑 李大龙〕